

郭良平专栏

入侵中国知识界的三个物种

中国近现代发展最快的阶段，都发生在政治比较宽松的时期。比如晚清、民国的“黄金十年”（1928年至37年）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50年代（大跃进前）和改革开放的头30余年。前两个时期的“宽松”来自政府控制力的耗散和不足；1950年代前期大一统体制尚未完全形成；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增长源自经济上的市场化、计划经济的解体和政治上的“放权让利”。当下中国正进入一个可能相当长的“收”的时期。经济上的“收”尚未定型，但政治上新的大一统体制的细节已基本清晰了。

虽然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，“收”几乎不可避免，但中国也同时在经受“高峰性格效应”。最高领导人的性格特点，尤其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里，对政策有广泛的影响。例如邓小平“举重若轻”，属于“放”型，于是在他的方针路线下，我们看到一个龙腾虎跃的改革开放局面。毛泽东也“举重若轻”，并且还带有浓郁的“革命的浪漫主义”色彩；他统治期间出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“打倒一切，全面内战”的局面。目前中国面临的是“举轻若重”和大规模制度建设所带来的“收”“压”“控”的效应。所带来的组织化的提高，在世界进入“百年巨变”动荡期中有优势，但如何在“收”中定型一个有充足活力和创造力的制度安排，是个巨大挑战。

造成大跃进和文革那种民族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体制内信息流通的失真，给决策者和全民造成的假象。官方宣传机器总是“形势大好，不是小好”。社交媒体时代应该是意见观点多元化，但旧传统仍然强大，它系统性地删减不同声音，再加上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，就形成不健康的政治正确的舆论环境。发表不同意见不光会被上边删帖，还会被周边“社死”，自我审查成为一种斗争艺术和求生的文化。在缺乏全面信息和充分讨论中形成的“民意”，必然会对大政方针有不良影响。

冷静和理性的缺位是大国崛起的大忌，没有这种品质，就无法控制领导人的头脑发热和全民的心理膨胀。上升期的老二最容易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，过早发起对“头羊”的挑战，结果往往是大国崛起的夭折。现代史上，德国的屡教不改，导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；苏联的膨胀终究不可持续，因为国力远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；日本在美军进驻下一直是个非正常国家，但也被不客气地压下去。中国现在也处在容易犯颠覆性错误的时期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知识分子的客观分析、争论和政策建议，能够起到关键作用。

不能“吃饭砸锅”的红线

针砭时弊、劝谏皇上和充当社会良心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；歌功颂德、粉饰太平则不是，但后者现已蔚然成风，这同中国知识分子在政经中结构环境的变化有关。毛泽东在1956年发出振聋发聩的一问：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”“毛”指的是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；“皮”是指旧的经济基础。毛的意思是要他们归附共产党这张新皮。从此以后，不能“吃饭砸锅”就成了知识分子的红线。

在新的大一统制度安排中，包括建立一个庞大的智库系统，设计功能是保证科学决策，但这种依附关系使功能大打折扣。比如各智库一般都隶属于某官方机构，是有官阶级别的，许多“独立”智库也是中宣部资助的。改革开放后的政经大环境，催生了知识界的三个外来入侵物种，使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式微。

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，简称马知。这里指的不是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，而是指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正统为生的学者专家。由于有官方意识形态和党政机构背景，他们在争论中一开始就处在不平等的优势地位。

“本本主义”是他们的特征，张春桥、姚文元可谓鼻祖。他们的学术模式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经学，总是在既有经典中打转。他们的话语自成系统，很少同现实交会。他们中只有极少数公开发声，但一发声就往往被围攻，或因他们的概念和理论太陈旧、离现实太远，或因“西学”已成主流。

但他们的辩论也最省事：一条语录就能“胜诉”，扣个大帽子就能让人闭嘴——故有邓小平名言：“要警惕右，但主要是防左”。他们有时也批评政治和社会现状脱离马毛，有的甚至充当文革搬运工，将那个遥远的时代梦幻般地搬到现实世界中来。市场经济中，他们的就业范围很窄，几乎全在体制内和正统下，因而很少有勇气得罪当局。另一方面，

“鸡知”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总体效果，现在还难以定论。他们对克服民族自卑、恢复民族自信起到催化作用，但方法的片面性也容易造成盲目自大和沙文主义，扼杀从晚清以来中国人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的热情和紧迫感。

当局也很难批驳他们不合时宜的观点，往往封杀了事。

第二类是公知，即公共知识分子。“公知”本来指中华文化传统中为劳苦大众发声，担当社会良心角色的读书人，但现在成了一个贬义词，特指崇尚西方自由主义、常对中国状况发出批评

的高级知识分子。他们是现代教育的产物，比起传统知识分子，他们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巨大优势，改革开放中“西学东渐”在学术界营造的生态，为他们提供了合法性。他们以客观、科学为道德勇气之源，对现状的批评一般确实是现实问题。但他们根据的是西方的概念、理论体系和方法论，故政策含义往往是向西方靠拢或者西化。现在他们自上受到当局发展“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”的巨大压力，自下面临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潮的冲击，日子相当不好过。

如果说以上两者主要活动在象牙塔阵地的话，第三类却有现实的社会功能：他们能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，提供心灵鸡汤，让他们感觉舒畅振奋，爱国热情高涨，故权以“心灵鸡汤知识分子”冠之，简称“鸡汤知”或“鸡知”，也是中国历史传统中所没有过的。

回到“天朝大国”的封闭心态

他们的角色类似美国越战失败后流行的蓝波（Rambo）那样的影视英雄。但同蓝波治疗战争创伤不同，他们要治疗的是经历百年之耻的民族长期形成的自卑，并充分利用这百多年中郁集起来的愤懑和仇恨，使这些情绪通过大国崛起的泄洪口，化为自豪而宣泄出去。

他们描绘的中国蒸蒸日上，势不可挡，充满阳光，因而很受欢迎和追捧。他们常常受邀讲演，而且场场爆满；个人社交账号粉丝成百上千万，明星高照，收入丰厚。但这种心理医生的角色，决定了他们必须对现实的阴暗面缄口不提，缺乏系统全面的理性分析，也从不批评当局。相反，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将领导人的一句话，一个讲话，一篇文章，一个提法，一个动作，一个表情等，发挥到极致，推向“伟光正”。

“鸡知”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总体效果，现在还难以定论。他们对克服民族自卑、恢复民族自信起到催化作用，但方法的片面性也容易造成盲目自大和沙文主义，扼杀从晚清以来中国人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的热情和紧迫感。他们所处的文化氛围里，贬抑他国是常态，介绍其他民族的优点和长处是犯忌的，尤其不能讲日本的优点。

在“我们一天天好起来，敌人一天天烂下去”的定调下，美国遍地乞丐和无家可归者，枪击案天天都有，毒品泛滥，种族歧视横行，警察凶神恶煞等等。这种叙事很容易使人回到“天朝大国”的固步自封心态，也助长网络时代特有的民众中的单向片面思维，阻碍民众心智的成熟和客观理性在中华文化中扎根扩散。

遗憾的是，中国知识界除了占极少数的“三知”外，广大的中间地带几乎集体失语，一片寂静。这也许是因为三知有成套的理论或大众心理需求来支撑，容易讲得头头是道，而中间地带很难拿出自己的朗朗口号来比肩，顶多是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这样缺乏性感的标语。“中庸”缺位是网络时代政治的通病，理性和深度交流讨论被“骂战”取代，这在选举民主国家造成社会撕裂和政治极端化，因为它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共识基础。中国的网上舆论也呈现两极化趋势，要么艳阳高照，要么黑云压顶；非对即错，非黑即白——外加谩骂和人肉搜索。

三者都有有用的东西可贡献，但与中国历史上儒道佛并存交融的传统不同，他们各说各话，而且坚持要大家接受他们各自的整个体系，而不只是其中有用的部分。

相比之下，“鸡知”不仅能满足大众心理需要，也符合当局宣传的大方向，容易成为主流，助推“政治正确”大潮。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很讲究“站队”和“表态”，这很可能是“马知”在长期实践中造就的，尤其是在他们飞黄腾达时期——文革中。他们正在等待下一个黄金时期。“公知”的力量源泉是西方自由主义“共识”，但中西关系的恶化和中国舆论环境的变化，往往将他们置于“政治不正确”的地位，但他们仍能在市场经济中找到支撑。

知识界“三知”的这种状况对大政方针有什么影响，是值得研究的课题。回归中华优良文化传统，试金石是魏征一类人物是否能再现——至少现在是不可想象的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